



总主编 / 江作苏
执行主编 / 喻发胜

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

——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为例

◎ 甘丽华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总主编 / 江作苏
执行主编 / 喻发胜

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

——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为例

◎ 甘丽华 / 著



新出图证 (鄂)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为例/甘丽华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622-6922-9

I. ①中… II. ①甘… III. ①记者—新闻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G2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6972 号

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

——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为例

© 甘丽华 著

责任编辑: 卢格蕙 冯会平

责任校对: 王 胜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编辑室: 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3040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u press.com>

电子邮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161 千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10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5
一、国外研究现状	5
二、国内研究现状	9
第三节 理论基础	13
一、理论假设	13
二、理论视点	14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21
一、研究方法	21
二、研究框架	25
第二章 机关报模式与记者职业身份的变形	28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新闻职业规定	29
一、“完全的党报”特征	29
二、双重使命：团中央与全国青年的喉舌	30
三、开明政治家与记者职业身份的体制内协商	34
第二节 体制内开放与职业意识的有限导入	37
一、读者来信受重视的时代背景	39
二、读者来信的特点	41
三、读者来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新闻实践的影响	43
第三节 职业身份认同错位：富有革命热情的“机关干部”	45

一、职业动机：服从组织决定	45
二、作为批判靶子的“资产阶级新闻观”	48
三、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消亡	51
第三章 新闻共同体的回归与记者职业身份的建构	56
第一节 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的转型	57
第二节 专业控制：“高水平的一致”	60
一、从直接控制到专业控制	60
二、对下：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	61
三、从“政治化”向“专业化”转型	62
第三节 深度报道：“主体新闻观”的建构与解构	64
一、深度报道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内部动因	64
二、“张建伟模式”与记者职业身份内部协商	67
第四节 自我认同：从普罗米修斯到西西弗斯	71
一、群体特征：底层生活经验	71
二、从普罗米修斯到西西弗斯的角色转换	74
第四章 媒介市场化变革与记者职业身份的解构	81
第一节 抵抗：夭折的公司化改革	82
一、作为抵抗的“主流大报”转型	82
二、“团中央机关报”表述的退场	84
三、失败的改革	86
第二节 商业化收编：记者考核条例风波	87
一、商业化收编之一：发行	87
二、商业化收编之二：记者考核	88
第五章 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分裂	92
第一节 认同的力量	93
一、合法性认同：新闻记者是一种职业	93
二、抗拒性认同：“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94
三、规划性认同：新闻实践的转型	97
第二节 记者职业身份认同建构的逻辑	99
一、“国家—媒体”边界关系的突破与职业意识表述	100
二、“媒体—公众”边界关系的建构与职业意识表述	102

三、记者群体内互动：职业身份认同的内化	104
第三节 分裂感的正面价值与负面意义	107
一、“半官、半商、半文、半武”的尴尬	107
二、收入多元化对职业身份认同的消解	109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开放语境中记者职业身份的社会协商	113
一、“边缘突破”的困局	113
二、开放语境中记者职业身份的重构	114
三、本书的不足	116
参考文献	117
附录一：访谈提纲	128
附录二：访谈记录（节选）	130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中国新闻界一直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记者这一身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退化”或“异化”。改革开放初期，这个群体努力使自己从“宣传工作者”回归到了“新闻工作者”。那时人们提起记者，总是把他们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无冕之王”、“瞭望者”、“观察家”、“舆论监督者”等词汇联系起来。但在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等转型过程之后，这些词汇慢慢被替换成了“狗仔队”，“新闻民工”，“防火、防盗、防记者”，“有偿新闻”，“有偿不新闻”，“妓者”，“化妆师”等。

周杰伦用他特有的歌声唱出了被社会极度污名化的记者形象：“我在回家路上/看到路标指着演艺圈/如果选择往前走/我就必须强壮/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冲出来好几只狗/我心想我什么时候/认养这么多只狗/他们咬着苹果/手里拿着长镜头/好像要对着我诉说什么阴谋/会说话的狗/他说他是为了狗周刊/看能不能拍我/多换几根骨头……”

但是大多数记者并不情愿认领这种社会评价。记者 I 认为，现在对于记者的指责大部分说的是都市类的媒体，他们完全追求媒体的点击率、阅读率，却不承担社会责任。当有人在她面前谈论记者的不是时，她的反应是：“我承认你说的（记者的不是），但我们《中国青年报》不在这个行列。”^①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念念不忘地在老前辈叶研

^① 引自本书作者对记者 I 的访谈记录。

电脑上看到的一首诗——“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当时，刘畅正准备去河北报道一起违规占地的事件，采访的难度和危险都不小，压力很大，忽然看到这首诗，心里激动得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不就是我的追求吗？和我当时的情景非常地相似，感觉心里很有劲儿！”^①

曾参加中宣部组织的报道沈阳市“2211”市民投诉热线电话采访活动的记者 H 这样描述自己的报道：

当时虽然是宣传任务，但是自己还是挺感动，觉得确实不错，跟着慕绥新市长来到沈阳的广场，涌出了一大群老百姓，高呼“慕市长好”。这让人感觉（慕绥新）口碑很好。虽然采访车队遭到大量下岗工人的阻拦，但是总觉得那是插曲，是末枝细节……自然过滤了，要看大局，沈阳作为重工业大城市，历史问题比较多，很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②

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他就这样与“宣传者”角色达成了妥协。可是宣传是掩盖不了“恶”的，三年后，慕绥新因犯有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逮捕。他听到这一消息时，对自己的职业充满幻灭感，事实上，他知道自己正在经历职业危机：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客观、公正、理性，去调查、去研究，然后形成报道，但是在很多实际工作中是宣传特定主体的愿望和要求。比如说报道一个自治区的大庆，或者一个劳模、一个官员从政的光辉事迹，这实际上是做宣传。你的身份，包括在《中国青年报》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你又不甘于仅仅根据材料写这个东西，这时就可能形成内心的挣扎、冲突。^③

H 内心存在的“难受”、“矛盾”、“困惑”也是这个群体的困惑，也是整个中国新闻界的困惑。

① 转引自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123。

② 来自本书作者对 H 的访谈记录。

③ 来自本书作者对 H 的访谈记录。

这三个场景构成中国新闻界的现状：理想与幻灭同在，“有劲”与无力并存。他们在新闻实践这“临场发挥的表演”^①中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建构着“仗剑走天涯”的意义。但如果“我们”不是“他们”，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三个似乎有点被滥用的“终极问题”又可以导出一系列问题：作为记者的职业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在其建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着“影响因子”的作用？这些影响因子又以什么样的“关系机制”相互作用？各种复杂多变的力量如何影响记者职业身份的变异？记者群体的职业规范是如何建立的？又处在怎样的变异过程之中？这种变异是丰富了还是消解了记者职业身份的内涵？

之所以选择《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作为个案，以此讨论中国记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建构，是因为《中国青年报》既处在中西新闻观的连接点上，也处于中西新闻体制的冲突点上。具体则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1) 典型性。《中国青年报》创办于1951年，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端时期停刊12年外，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期，具有相应的完整性。从其创办至今的发展历程，比较鲜明而典型地体现出中国社会尤其是转型期各种社会控制因素与报业组织新闻生产的互动关系，可以成为我们解读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与媒介系统怎样发生关联的生动案例。

(2) 矛盾性。《中国青年报》在对外介绍时，有两个名称最常出现：“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级大报”。但在现实中，它却被认为“说是机关报又不那么机关，说是市场报又不那么市场”。在体制性矛盾、职能性矛盾、理念性矛盾交织的背景下，《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常常陷入身份的矛盾中——既要做好宣传者，又要做好新闻记者。

实际上，恐怕很少有媒体像《中国青年报》这样为“身份”所困。从这张报纸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这样的困惑。

在创刊那年，《中国青年报》就因为只刊登青年庆祝“七一”活动而未刊载首都纪念“七一”大会的全貌报道而受到批评，并在报纸上做公开检讨：“不是以党和人民为主体，而却是以青年为主体”，“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可能形成

^①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新闻学研究》，2002（71）。

青年主义的偏向”^①。

在扮演“宣传者”的角色中,《中国青年报》常常面临“尺度”把握问题。1957年,该报国际部负责人坦陈:“青年报的时事宣传,任何时候不能超过《人民日报》。”而这是“要懂得本报的身份。凡重大国际问题,只能先由《人民日报》发言,我们不能抢先,不能超越党报观点”^②。

而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它同样遭遇“身份”之困:“作为团中央机关报,是应该只批评团内的事情、青年的事情,还是可以批评各方面的事情?”创刊初期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张黎群认为《中国青年报》具有双重身份:“我认为在青年报上是可以批评各方面的事情的。至于报纸‘身份’的问题,我们觉得不能这样说。《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是一个青年工作部门的报纸。但是,她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她也是一个舆论机关,在这一点上她和任何一家报纸一样。”^③

直到2002年,这家报纸在面临“公司化”改制、试图用市场彻底告别“真理报模式”的时候,依然纠结于“身份”:“我们的确处在体制的夹缝中。在悲观主义者看来,我们既没有《人民日报》那样的体制优势,也没有《北京青年报》那样的市场优势。”^④

但也正是这种“说是机关报又不那么机关,说是市场报又不那么市场”的“身份”为《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实践提供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在其近50年的办报实践中,屡屡成为“新闻改革的旗帜”。

布尔迪厄曾说过:“事实上,我的全部科学事业都从这一信念中得到启示,即确信只有深入到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⑤

本书也愿做这样的尝试,进入具体的社会情境、具体的实践主体、具体的新闻产出,从新闻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勾画媒体新闻生产实

① 中国青年报社新闻研究部:《中国青年报宣传大事记(1951-1990)》,内部出版,1991:7。

② 中国青年报社新闻研究部:《青年报人的回忆——纪念中国青年报创刊三十周年(下册)》,内部出版,1981:107。

③ 中国青年报社新闻研究部:《青年报人的回忆——纪念中国青年报创刊三十周年(上册)》,内部出版,1981:18。

④ 中国青年报社新闻研究部:《青年报人》,内部刊物,2002(1):11。

⑤ 皮埃尔·布尔迪厄,谭立德译:《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

践过程的“厚重描述”和考察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的特征的“理论阐释”，探究和理解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以及其所面临的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角力与协商。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黑人民权、男女同性恋、少数民族争取权利、宗教复兴、嬉皮士等一系列“认同政治”运动席卷全球。在这种背景下，性别、种族、文化等身份认同问题被带入学术分析的中心视野之中，而几乎所有的讨论都围绕着“identity”展开，霍尔（Stuart Hall）和鲍曼（Paul Bowman）将其称为围绕“identity”的爆炸性研究^①。

在对这些认同政治运动的研究中，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争成了最大的争论点之一，并且超越了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领域。卡尔·霍恩等人认为，社会建构主义之势已经远远超过社会学本身，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已经成为人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

本质主义认为，个人的“identity”是自然拥有或生成的，通过个人的意志和理性而获得，因此人们对自身的存在有清楚的认识和理解。个人及其隶属的群体的“identity”都是内在的、同一的、确定的、整体的、统一的、总体性的、有边界的，是人们把握自我和根植于社会的基点。

深受萨特、福柯等人的影响，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与本质主义者针锋相对，认为“identity”是社会建构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女人之所以成为女性，是社会通过一些知识的教化机制和权力的惩罚机制而强制建构的。因此个人和群体的“identity”是强加的、分裂的、流动的、残缺的、碎片化的、开放的。

可以说，围绕“identity”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欧洲血统”。发展出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布里斯托学派就是证明。1967年，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从英国牛津大学来到布里斯托大学，带领他的学生

^① 张静：《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7。

们打破北美主流的“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开创了社会认同理论，革新了对群际过程的研究。社会认同论，超越了前泰弗尔时代北美盛行的还原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微观——利益解释路径，基于行动者的多元群体资格来研究群体过程和群际关系^①。

以泰弗尔、特纳（John Turner）、豪格（Michael Hogg）等为代表的社会认同论的观点超越社会心理学范畴，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认为，个体以他们的社会群体资格来定义自身，依群体界定的自我感知会对社会行为产生独特的心理影响。具体观点有：为了赋予群体成员积极的社会认同，社会群体需要建立起一种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积极特异性；对内群体成员有偏好而对外群体成员有歧视；当某些群体成员身份所带来的社会认同不令人满意时，群体成员会试图离开那个群体（心理上或实际上）而加入具有更多正面独特性的群体，或使他们所在的群体具有正面独特性。

身份认同也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②

霍尔提出，关于“文化身份”，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的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

第二种立场则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或者说——由于历史的介入——构成了“真正的过去的我们”。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③。

而霍尔本人偏向的是第二种立场，也即建构主义者的立场——“只有从这第二种立场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殖民经验’痛苦而令人难忘的性质”。

① 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高明华译：《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

② 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11。

③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15。

文化身份根本不是固定的本质，不是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没有打上任何历史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经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其编著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一书的导言中，霍尔提出，像所有重要的实践一样，身份认同是“运动的”^①。

笔者以“journalist”和“professional identity”为关键词，运用 SAGE 电子数据库^②进行检索，得到了 215 篇相关研究文章。总体分析，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议题：

(1) “特殊”记者群体的职业身份认同，如黑人记者、女记者、小报记者、法国的调查记者等。如斯雷(Holly S. Slay)对 20 位著名的非裔美国记者的口述或书面回忆录进行了叙事分析，讨论他们如何通过职业身份与污名化的文化身份(“黑人”)之间的协商，从而建构自己的职业身份认同。该研究发现美国非裔记者的职业选择大多受到家庭价值观和早期生活经历的影响，大多遭受过被当做“外人”的疏离经历，其职业升迁受到“黑人”身份的影响。因而美国非裔记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建构和白人记者有显著不同，他们通过对职业规范、污名、自我的“再定义”，来构建积极的职业身份认同。比如非裔记者并不赞同主流的或者说白人定义的“客观”报道方式，而更倾向于采用“鼓动者”的报道立场。他们对污名化的身份采取积极的态度，认为这一文化身份为他们的记者职业提供了特殊的、新颖的观察力^③。

(2) 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记者职业身份认同，如阿拉伯国家、印度、俄罗斯、欧盟国家、巴勒斯坦、土耳其、以色列、乌干达及中国调查记者的重新兴起等。这些国家或地区总体特征是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较大社会变迁，相应的也影响到其记者的职业状态与职业身份认同。

如英国金斯顿大学的 Noha Mellor 采用布尔迪厄的“文化中介”理论

① 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3。

② SAGE 公司于 1965 年成立于美国，至今为止已经与 180 多家专业的学术协会和组织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主要为欧美协会和组织），其电子期刊数据库主要以高品质社科人文期刊为主，收录了 77 种心理学期刊，87 种社会学期刊，37 种传播学期刊。

③ Holly S. Slay, Delmonize A. Smith.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using narrative to understand the negoti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stigmatized cultural identities. Human Relations, 2011, 64 (1): 85-107.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以及泽利泽将记者视为“阐释共同体”的观点,对基地不在阿拉伯地区内但受众目标在阿拉伯地区的媒体记者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应该将他们视为文化生产者、具有共同定义的“阐释共同体”,从而分析其职业身份认同的形成^①。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其新闻记者成为关注重点之一,尤其是调查性记者。

通过对记者的深度访谈以及在两家新闻编辑室的参与式观察,童景荣(音)发现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中国调查性报道记者常常采用五种“游击”战术:选题技巧,不触碰底线;通过建设性批评的方式发表政治评论,表示自己和官方处于同一战线;“春秋笔法”,在坚持“客观性”的基础上通过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表达自己的观点;援用能被官方接受的消息源的话语;隐身采访,不透露记者的身份^②。

德波夫(Hugo de Burgh)认为,尽管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中国记者仍把调查性报道作为社会变革和其职业重要性的重要标志。调查性报道的兴起是新权利话语的体现、新社会共识的边界划定以及“西方化”的一种表达。尽管在报道主题和报道技巧上已经可媲美英、美国家的调查性报道,但通过中国记者对自身职能和角色的描述,德波夫提出,认为中国记者已经认同外国的或者说现代化的记者定义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中国记者不是王的制造者,相反“无冕之王”的说法显得更为适当,是其文化价值的再生产组织^③。

(3) 特定报道领域的记者群体,如科学报道记者、艺术报道记者、体育报道记者等,并特别关注了新技术的发展给新闻从业者和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带来的影响,如新出现的视频记者、游戏工业从业者等。

视频已经成为多媒体报纸网站的要素之一。拍摄、编辑视频及为视频配文成了纸媒记者的新任务和新挑战。玛丽·伯克(Mary A. Bock)采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报纸网站的视频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无论是文字记者还是摄影

① Mellor, Noha. Arab journalists a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8, 13: 465-483.

② Tong, Jingrong. Guerrilla tactic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Journalism*, 2007, 8 (5): 530-535.

③ De Burgh, Hugo.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Media Culture Society*, 2003, 25, 801-820.

记者,纸媒记者制作的视频时间更长,更倾向于让拍摄对象自我展示,不同于电视记者所制作的视频那样直接、紧凑。通过这种区分,纸媒记者表明自己比电视记者更严肃的文化身份,以确保他们在传统新闻业中的权威地位^①。

三位美国传播学者通过对美国游戏行业从业人员的访谈及对其博客的分析,认为,不像电影或新闻等其他媒体产业的从业人员,游戏开发者很少得到关注。因为总是有人等着以更低的报酬、更勤奋的工作进入这个行业,所以游戏开发者不得不接受各种各样的妥协:每周超过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整个行业形成的“工作就是玩耍”的氛围使得他们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行业协会的缺位和明晰业绩标准的缺失使得游戏开发者的职业身份模糊甚至被遮蔽了。游戏开发者必须在后工业化的新媒体经济中找到彰显自己职业身份的新模式^②。

二、国内研究现状

以“职业身份认同”和“记者”为关键词、主题、题名或篇名等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得到的结果极少,再以两者进行全文搜索,并以“职业身份认同”加“新闻工作者”、“新闻从业人员”等进行对照搜索,剔除相关度不高的文献,可对国内相关研究作出如下总结。

旗帜鲜明地运用“职业身份认同”这一概念的是兰州大学教授樊亚平。他将职业身份认同作为新闻史人物研究的新视角,除发表数篇相关论文讨论史量才、梁启超、蔡尔康等人的职业身份认同外,还出版了专著《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研究(1815-192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樊亚平的研究勾勒出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的早期发展史,并作出了清晰的论述:

从近代报纸产生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为第一个阶段。该阶段的新闻从业者大多处于寄生者与拓荒者状态,难以对所从事的办报工作产生真正认同,对报纸的认知和办报行为间存在矛盾和不一致,身上呈现文人、士人、才子等角色与办报者角色的多重身份冲突,充满无奈与矛盾。

甲午战败至民国成立前为第二阶段。救国、革命的政治办报者兴起,出现

① Mary A. Bock. Newspaper journalism and video: motion, sound, and new narratives. New Media Society, 2012, 14 (4), 600-616.

② Deuze, Mark, Martin, et al.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game workers. Convergence, 2007, 13 (4): 335-353.

第一代报业家。这个时期的不同办报者，其涉足报刊领域的直接动机都与各自的政治志愿与理想有关；对报刊的认知方面都有视报刊为政治工具之倾向；其办报活动或服务于直接的政治活动及其目标，或具有强烈的政治批评与干预功能。

民国成立到北洋军阀统治末期为第三阶段。职业记者初步长成，以邵飘萍和史量才为代表的两类新闻从业者，其职业身份认同与前一代相比“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进化与发展”^①：他们对新闻职业大多充满热爱和兴趣，心怀新闻志趣与理想；职业投入度高；超越“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阶段和层次，认同的是新闻职业本身；对新闻的认知达到了相当全面、深入的层次；以其新闻职业身份与角色为荣，对自己的记者或报业家身份表现出较强烈的认同。

樊亚平认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成长历程是艰难的，职业身份认同之路滞重、坎坷，充满对抗和博弈，经历了从不得已“堕入”到主动投身，从“谋食之道”到“新闻救国”，从功能认知到职业化认知，从“身在曹营心在汉”到“唯对新闻有兴趣”，从耻言身份到以“记者”为荣等的渐次演进，但其职业演化与逐渐成熟的趋势和方向基本是明确的。他进而认为，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孕育之路已基本成熟，一批领风气之先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已经诞生。这些职业意义上的新闻从业者对新闻职业普遍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认同。“经过近代报纸诞生以来百余年的艰难孕育，中国的新闻职业化之路确已大功初成，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在中国也确已呱呱坠地”^②。

田中初在《规范协商与职业身份认同——以阮玲玉事件中的新闻记者为视点》中，围绕新闻记者的规范协商与职业身份认同问题，展现20世纪30年代处于职业化初期的新闻记者如何通过职业规范的协商来尝试建立自身的职业身份认同。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塑造了一个采访浮夸、造假新闻、屈从权贵、揭人隐私的不良记者形象，导致当时一批新闻记者的强烈抗议。作者认为，新闻记者正是借用这一纠纷表达了一种集体诉求，那就是：处于职业化初期的新闻记者，更希望能以合乎职业规范的正面形象呈现在民众面前，以此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和成就感，增强职业合法性，巩固社会以及群体内部的职业身份认同。

① 樊亚平：《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研究（1815-1927）》，人民出版社，2011：228。

② 樊亚平：《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研究（1815-1927）》，人民出版社，2011：262。

而随后阮玲玉迫于多种压力而自杀引发社会对新闻记者违背职业规范的行为进行了一次集中的质疑和声讨。作者认为,这些社会批评的背后恰恰潜藏着民众对新闻记者职业的价值企盼和身份想象,内心深处仍对新闻记者怀有“无冕之帝王、社会之师表”的角色期待,因此自然而然地会对新闻记者提出更高的职业要求,希望他们成为“纯正无垢之自然人,始克完成其光辉赫赫之天职”^①。从这一角度来说,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无疑是促进新闻记者群体反省和规范修正的一种动力。

同时,围绕着职业规范界限的划清和修补,一场论争同样在新闻记者群体内部进行着。一部分记者进行了自我反思^②。

姜红、於渊渊在《从“名士”到“报人”:近代中国新闻人职业身份认同的承续与折变》中认为,传统的“士”已不在,但“士志于道”的精神还在;传统的“天下”已经消散,但“天下为公”、“兼济天下”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感还在。它们内化为新闻记者和报人的自我认同和职业身份认同。传统的德性伦理更是以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君子理想”附魂于现代记者和报人的职业身份认同中。这些传统观念与现代西方新闻职业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无法忽视的“苍茫浓重的传统文化底色”^③。

王肖潇在《从身份认同看建国后记者的职业身份转变》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记者身份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一是从高高在上的宣传者到报道社会建设的参与者;二是在社会转型期转变成监督者与守望者。当代记者则在媒体角色定位不明的情境下,对自身的职业角色处于迷惘与挣扎之中^④。

牛元梅在《身份认同理论在媒体运用中的三种模式》中指出,身份认同理论是社会研究的范畴,近几年作为跨学科研究视角被引入新闻传播学,并主要应用在三个方面:传媒参与构建身份认同、媒介自身及从业者身份认同的构建、受众主动使用媒体构建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理论在媒介自身身份构建研究中存在着非主观主动性的特点,即很多研究成果没有明确使用身份认同的概

①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0-11。

② 田中初:《规范协商与职业身份认同——以阮玲玉事件中的新闻记者为视点》,《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

③ 姜红,於渊渊:《从“名士”到“报人”:近代中国新闻人职业身份认同的承续与折变》,《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1)。

④ 王肖潇:《从身份认同看建国后记者的职业身份转变》,《新闻传播》,2011(6)。